

集部经典丛刊

谢灵运集

岳麓书社



责任编辑 吴泽顺
封面设计 胡颖

谢灵运集

李运富 编注

岳麓书社出版发行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长沙市华中印刷厂印刷

1999年8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14.5

字数:380,000 印数:1—5000

ISBN7-80520-704-6

1·468 定价:18.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出版科调换

社址:长沙市新民路10号 邮编:410006

前 言

谢灵运，生于东晋孝武帝（司马曜）太元十年（公元385年），死于南朝宋文帝（刘义隆）元嘉十年（公元433年）。祖籍陈郡阳夏（今河南太康县一带），出生地在会稽郡始宁县（今浙江上虞县南及嵊县西北）。祖父谢玄，因为淝水战役有功而封爵康乐公。谢玄死后，谢灵运十五岁由钱唐（今浙江杭州市）入京师建康（今江苏南京市），袭封康乐公。当时还授他员外散骑侍郎，但谢灵运“不就”。谢灵运真正作官始于东晋义熙元年（公元406年），那时他二十一岁，任琅邪王大司马行参军。第二年，改从刘毅任记室参军，先后随刘毅镇守豫州、江州、荆州，在荆州时改任卫军从事中郎。义熙八年刘毅反刘裕而兵败自杀，谢灵运转投刘裕任太尉参军。次年随裕还都，任秘书丞。义熙十一年任咨议参军，转中书侍郎，后又为世子中军咨议、黄门侍郎。义熙十四年，刘裕在彭城（今江苏徐州市）建宋国，谢灵运任宋国黄门侍郎，迁相国从事中郎。元熙元年（公元419年），谢灵运由彭城返京，任世子左卫率。次年，东晋亡，刘裕建宋朝，将谢灵运的公爵降为侯爵，仍任太子左卫率。永初三年（公元422年），刘裕死，少帝即位，谢灵运被权臣徐羨之、傅亮排挤出京，任永嘉郡（今浙江温州市）太守。在职一年，谢灵运托病回故乡始宁隐居。元嘉三年（公元426年），宋文帝诛徐羨之、傅亮等，召谢灵运回京任秘书监，寻迁侍中。因无实权，谢灵运不满，经常擅离职守，肆意遨游。于是文帝讽旨令自解，谢灵运就趁机托病回故乡，开

始过第二次隐居生活。元嘉五年被免官。元嘉八年，因决湖造田之事被会稽太守诬告，谢灵运急驰京师申辩，文帝不予追究，但不让他再回会稽，而派他到临川（今江西抚州市西）任内史。谢灵运在临川依然荒废政事，陶醉山水，再次为有司所纠。司徒刘义康遣使收谢灵运，他竟然兴兵拒捕，犯下死罪。文帝惜其才，不忍加害，于是降死一等，流放广州。元嘉十年，却又有人告发谢灵运参与农民谋反，皇帝终于下令在广州将谢灵运杀头示众。

二

谢灵运的一生是复杂而悲惨的。作为政治人物，我们不想多说，历史自有评判。这里只想简单介绍一下作为文学家的谢灵运，他的诗文创作的基本内容和特色。

（一）山水诗文是谢灵运创作的主要内容，因而奠定了他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魏晋时期，玄学盛行，文学创作受到严重影响，玄言诗的晦涩艰深、无病呻吟就是突出的表现。陶渊明创田园诗派，对玄言诗已有不小的冲击，而真正扫荡玄言诗，开创整个诗坛清新明丽风格的还是谢灵运。本集收录的两百余篇（首）诗文，约有三分之二是主要描写山水的，“名章迥句，处处间起；典丽新声，络绎奔会”（钟嵘《诗品》卷上），真是令人应接不暇。可以说，谢灵运是我国第一个大量发掘自然美，自觉地以山水景物为主要审美对象的文学家。他的山水诗文往往能将情、景、意融为一体，境界开阔，清新自然，对后世影响很大，受到历代评论家的高度赞扬。例如清人王夫之说谢灵运《登上戍石鼓山》诗“情不虚情，情皆可景；景非滞景，景总含情”（《古诗评选》卷五）。南朝宋鲍照评论说：“谢五言如初发芙蓉，自然可爱。”（《南史·颜延之

传》)明王世贞云:“余始读谢灵运诗,初甚不能入,既入而渐爱之,以至于不能释手。其体虽或近俳,而其意有似合掌者。然至浓丽之极,而反若平淡,琢磨之极,而更似天然,则非余子所可及也。”(《艺苑卮言》)唐白居易认为谢诗能包容万千气象,“大必笼天海,细不遗草树”(《读谢灵运诗》)。有关谢灵运山水诗的赏析评论随处可得,这里就不再赘述了。值得注意的是,仕途偃蹇,政治上遭受排挤打击,使人不得不把目光转向大自然,把山水看成官场的对立面,从而深爱之、咏叹之,这种避世隐居(包括名仕实隐)的生活固然是谢灵运创作山水诗并取得重大成就的直接原因,但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谢灵运并不是一个真正的隐者,他的留连山水甚至隐居,不过是一种仕途失意的消极反抗方式,其实心底里对高官厚禄的贵族生活并未忘情,所以他时刻处于作官与隐退的矛盾之中,这种心态在他的诗文创作中有比较普遍的反映。一方面在欣赏山水风光时经常流露出对亲友和过去生活的依恋,另一方面在赞美自然景物中又反反复复地表示自己要抛开世俗,隐居修养,之所以要“反反复复地表示”,其实正是他内心深处矛盾犹豫的结果。这种矛盾心态造成了谢灵运山水诗文的特有风格,即在写景叙物之后或之中往往会加上一些表述自己心愿或叹惜感悟性质的话,这虽然可以说是“融情入景”,对我们认识谢灵运的为人有一定帮助,但入景之“情”如此单调,千篇一律地重复,也难免影响山水诗的意境,使读者乏味。

(二)如果说政治上的失意导致了谢灵运走向山水,那么热衷佛事、徘徊道门恐怕也是谢灵运逃避现实的一条出路。谢灵运一生与佛教关系密切,特别是二十八岁以后参与了一系列佛事活动,因而产生了相当可观的佛教方面的作品。如义熙九年(公元413年)冬或十年春应释慧远之请作《佛影铭》;永初三年(公元422年)秋至景平元年(公元423年)秋在永嘉

任太守时与诸僧辩顿悟义，写下《辨宗论》及答诸道人问等多篇专论；景平元年秋至元嘉三年（公元426年）春第一次隐居故乡始宁时，建石壁精舍，与县隆、法流诸道人共游，作《和范光禄佛像赞》（三首）、《维摩经十譬赞》（八首）、《和从弟惠连无量寿颂》等；元嘉八年（公元431年）在京师与释慧严、释慧观共同改治《大般涅槃经》，著《十四音训叙》，为《金刚经》作注等等。佛之与道，既有区别，也有联系，特别在逃避现实这一点上它们是相通的。谢灵运研究佛学的同时，受道家思想的影响恐怕更为深刻，道家的顺性轻物主张几乎成了他的行动指南。他为官不愿循规蹈矩，散漫放纵；他羡慕隐士，追求岩栖穴居以修身养性；他对道家经典推崇备至，几乎言必称老庄，以致于连山水诗也往往拖着一条玄理尾巴；他作《山居赋》、《逸民赋》、《入道至人赋》以及《衡山岩下见一老翁四五少年赞》，反复展示自己的内心宿愿，歌颂仙隐道士，其实都是道家思想的反映。佛道属于哲学范畴，阅读欣赏这方面的作品应该带有理性的睿智。

（三）谢灵运是一个非常重感情的人。他一生坎坷，但尊亲重友，情真意切，因而回顾往事、思念亲友、寄托自己情谊的诗文占有一定比例。他敬爱自己的祖父，撰《述祖德》诗二首以颂扬之；他与自己的族人（堂叔伯兄弟等）关系密切，亦亲亦友，互勉互励，交情感人，所以留下了《答中书》、《赠从弟弘元》、《赠从弟弘元时为中军功曹住京》、《赠安成》、《答谢咨议》、《酬从弟惠连》、《答谢惠连》、《与从弟书》、《答从弟书》等一系列充满亲情友爱的诗文；他对朋友以诚相待，平时晤赏倾心，死后悲伤哀悼，所以他拥有庐陵王、范泰、颜延之、羊璇之、何瑜之、慧远、县隆、雷次宗等一大批朋友，也写下了一批与朋友唱和应答以及追思谏悼的书信诗文，如《送雷次宗》诗、《答纲琳二法师书》、《与庐陵王笺》以及《慧远

法师谏》、《县隆法师谏》等等。

(四) 我们当然不应忘记谢灵运主要还是个贵族官僚，他毕竟在官场上混过大半生，因而他的荣辱兴衰、行事经历自然在诗文中也会得到反映。通过《谢封康乐公表》、《九日从宋公戏马台集送孔令》、《彭城宫中直感岁暮》、《三月三日侍宴西池》、《侍泛舟赞》、《命学士讲书》、《种桑》、《撰征赋》、《辞禄赋》、《劝伐河北表》、《自理表》、《临川被收》等诗文，我们不难看到一个在官场游戏挣扎的政客形象。

(五) 剩下的诗文可以概括为闲杂类。或拟古，如《会吟行》等乐府诗；或就俗，如《东阳溪中赠答》二首有民歌风情；或代人捉笔，如《拟魏太子邺中集诗》八首；或游戏唱和，乃至拆字为诗，衍事成文，如《作离合》、《七夕咏牛女》、《江妃赋》等等。纯粹是些无关痛痒的消闲作品，但从中也可以看出一些文人的才情与志趣。

谢灵运的作品从内容上看，大致就可以分为上述五类，其中第一类和第三类艺术成就最高，因而流传得更为广泛些。但如果要对谢灵运的人生经历、思想感情、志趣爱好以及文学创作情况作全面深入的了解，那其余三类作品也是不应忽视的。

三

我对谢灵运及其诗文素无研究，因朋友的照顾，替我在岳麓书社的“集部经典丛刊”选题中接下编注《谢灵运集》的任务，说好半年内交稿出书。原以为这是份美差事，不用费多大气力就会有可观的收益，比起我花数年功夫才做出一本薄薄的“专著”还要靠朋友帮忙才能出版还不好意思要稿费来自然划算。却不料真正动将起来竟也非常棘手，前前后后断断续续弄了两年多才弄出现在这样子，作为“编注”类成果，委实有点

得不偿失了。不过，由原来对谢灵运的一无所知，经过这番折腾后终于能略知一二，这又似乎可以用“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来安慰了。

如果让专家来做这事，自然是轻而易举，可我并非专家，问题就多了。首先得把谢灵运的诗文收集起来加以编排，能找到一种比较全的本子作基础那就最好。于是请教了几位搞古典文学的老师，问是否有今人所作的谢灵运集或注本，答曰不知道。隔行如隔山，连他们都不知道，我可得要小心了。赶紧到图书馆去查，查来查去，发现了这样几种书：一是明张溥纂《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中的《谢康乐集》，线装本二卷，收诗文共119篇（其中诗81首，文38篇）；二是清人严可均纂辑的《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其中《全宋文》卷三十至卷三三（部分）是谢灵运的文，共49篇（包括部分诗序）；三是近人丁福保编《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其中《全宋诗》收谢灵运诗81篇；四是今人逯钦立辑校的《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其中《宋诗》收谢灵运诗100篇；五是近人黄节的《谢康乐诗注》，以焦本《谢康乐集》为底本，收注谢诗78篇；六是今人叶笑雪的《谢灵运诗选》，选注谢诗56篇。各本所收谢灵运的诗文互有异同，数量不等。我既非专家，自然无法考证谁是谁非。原想“宁滥勿阙”，以求其“全”，所以凡是各家收录的都“加”起来，去其重复，就成了我所编定的集子。这样做的结果，所收诗文数目无疑是最多的，窃喜这才是真正的“全集”，于是“收编”的工作宣布大功告成，接着进入了“校注”阶段。

校勘应该选择善本全本作底本，张溥本是我当时所见唯一的全本，但属线装孤本，图书馆不出借，也不让复印，我请人去照了相，洗出来又不太清楚，因此只好将诗文分开：诗用黄节本照录，增补参校其它本（主要是逯校本）；文用《全宋文》

照录，用张溥本及中华版《宋书·谢灵运传》所收各篇对校。好在各本大都附有校记，总其成也就不算太难。真正难作的是注释。上面所列前四种属辑校性质，后二种才是注读本。黄节本用的是旧注形式，仿《文选》李善注，主要作征引词句出处的工作，对词义句意很少作正面的解释，所以并不适合普通读者阅读。叶笑雪的选注本倒是比较地现代化了，字词句义大都有了比较通俗的解说，还对全诗加以评述，便于读者对诗意作整体的把握，但他只注解了56篇诗。黄、叶两种注本加起来，可供我们参考的诗注不到80篇，还有近20篇诗没有任何参考资料可供利用。至于文，那就更得白手起家了。如果说谢诗在各种古代诗选中都能找到若干首代表作的话（当然不会超出黄、叶所注的范围），那谢文既无单注单选本，甚至所有的古代文选（包括针对性很强的魏晋南北朝赋选之类）中都难以见得到谢灵运的名字，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奇怪的现象，难道谢灵运诗名那么大，而他所写的数十篇文章（字数要比诗多两倍）竟然就没有值得“选读”的？这种遗憾自然给我们编注谢灵运文集带来了难以克服的困难。特别是对于我这个外行来说，收编一下还可以对付，要替谢灵运的诗和文全面作注，根本就不具备条件。但既然出版社要求带注，以便具有中等文化程度的人能够阅读，我也就只好在黄、叶诗注的基础上利用各种工具书硬着头皮一首一篇地慢慢注将起来，其间因无法作注而卡壳甚至生气搁置不管的事时有发生，这样拖到什么时候能作完还很难说，真是后悔不该捡这个“便宜”了。

天无绝人之路。在我盲目折腾了一年多之后，98年4月幸得学友王云路君惠赠大著《汉魏六朝诗歌语言论稿》（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7年11月），其“参考书目”中赫然列有顾绍柏先生的《谢灵运集校注》，我喜出望外之余，颇为感到纳闷，这本42万多字由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年出版并印行了

2000册的学术著作，怎么在北京师范大学这样的名牌图书馆里就没有呢？赶紧托人到外单位去找，结果是学友赵平安兄替我从北京大学图书馆借到了一本。拿回来一看，却又傻了眼，这可以说是谢灵运集的权威本子，各方面的资料都有，除文章部分还来不及详注外，简直可以说完美无缺，人家都研究到这份上了，我还去穷折腾啥？干脆拉倒不弄了！可出版社不答应，他们认为读者对象不同，丛刊规模不同，编纂体例不同，注解详略不同，应该还有再出版的价值，所以要我参考顾著继续弄完。仔细想想也是，作为文学史上的一代大家，近二百篇（首）的诗文，仅有一种今人的注本就能满足广大读者的需要？我已经弄得差不多了，对照顾本再作一些调整，补足原来阙疑的部分，拿出来应该还是会有自己的特色的，要真的放弃，前面一年多的功夫岂不白费！如此想来，我就决定以顾先生的《校注》为蓝本，充分吸收他的研究成果，对我原来的编注初稿重作董理，结果形成了现在这个样子。下面就本集在编、校、注及附录等方面与顾本的不同做法作点说明。

顾先生在《前言》中说：“谢灵运原有集，早已失传，今所见诗文集都是明清人据总集、类书、史书等纂辑而成。最早为明沈启原等辑、焦竑校勘并刊行的《谢康乐集》，共四卷，收诗文一百一十篇，但并不全，且有舛讹。……嗣后，张溥纂《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其中《谢康乐集》二卷较之沈辑本又有增益，共收诗文一百一十九篇，但仍不全。它纠正了沈辑本的部分错误，同时又增加了一些新错误。……至于二书在文字上的讹误，亦有可指摘处。但是相比之下，它们还算是较好较全的，其余辑本多未超过他们。清严可均编《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近人丁福保编《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所辑灵运诗文数量超过了以前的总集和别集，但仍不能说收罗无遗。于是又有近人冒广生在张溥辑本的基础上再次钩沉，纂成《谢

集拾遗》一卷，成绩可观，虽仍有遗漏，但是已经很少了。由于迄今没有一部理想的、完整的辑本，所以我索性另起炉灶，重新从现存的总集、类书、史书等古籍中寻采采撷，哀辑成目前这本诗文集，厘定为一百三十九篇，其中诗九十七篇（存目四）。”顾先生确实比前人多辑出了不少篇目并增加了某些原有篇目的内容，同时对前人错收、重收的篇目作了考证和删除。我们基本上接受了顾先生的辑证成果，只是前人收入的某些篇目是否错收、重收或分割，恐怕见仁见智，我们担心过于严格而漏收，除了字句完全相同的篇目酌收一处（如《石门岩上宿》和《夜宿石门》实为一篇），以及所有诗序随诗收录而不再作为文重收（《全宋文》收有《述祖德诗序》、《赠宣远诗序》、《拟魏太子邺中集诗序》等三篇，其实不妥，因为其它诗序并未一律提出来独立，唯此三篇单列为文，既重又不合体例，故删）之外，其它只要有文字差异的所谓错收、重收或分割的篇目仍予以保存（如《咏冬》、《楠溪》诗之类），但分别注明疑误、疑重及可与某篇合并的理由，以便别人进一步研究决定。又答王卫军问及书、答纲琳诸道人问及书，顾本重在保存原貌，故将数人书、论合为一篇，我们考虑到阅读的爽目和文体的分类，从《全宋文》将各人之书信与问难一一分立。另外，顾先生辑出了谢灵运所撰《晋书》的若干片段却作为附录处理，我们认为这也是谢灵运所作之文，故独立篇目正式收录。如此这般，我们所收列的篇目就与顾本不完全相同，总计收入诗文 153 篇，其中存目 4 篇，存疑 5 篇，正式立目的诗 94 篇、文 50 篇。篇内含有多首或多个小标题者皆按一篇计数，故实际上应有近 200 篇（首）。当然，其中有一些是属于残篇。

顾本将收录的“诗文分别按写作时间先后编排。乐府诗不编年，置于杂诗后，这是因为只有少许如《会吟行》、《鞠歌行》、《苦寒行》等可大致确定写作年代，多数无可考。为了保

持乐府诗的全貌，我们没有将有年代可考者单独抽出置于编年部分。文亦有四篇无法判断写作时间，故置于文类编年部分之后”（见《前言》）。前人编的集子比较注重文体分类却完全不顾时间先后（如张溥《谢康乐集》），顾本则强调时间先后（虽然由于许多作品的时间不明而事实上无法贯彻到底）却相对地忽视了诗文内部的分类整理。我们想综合两家的长处，以分类为纲，以时间为纬，尝试给读者提供一个多维度的编排体系。即首先分为“诗集”和“文集”两编。“诗集”中先将存目、疑重的诗篇单独抽出附列末尾，其余正篇按体裁分成“乐府诗”和“杂诗”两部。“乐府诗”不再分类，按四言、五言、六言、杂言顺序排列。“杂诗”又按内容（是否与谢灵运自己的言行直接相关）分为“行事诗”和“闲杂诗”两类，各类按诗作时间先后排列，“行事诗”还进一步分期编年，以便读者了解诗人的生平事迹。“文集”按体裁和内容分为“赋”、“书·笺”、“论·答问”、“赞·颂·铭”、“诔”、“表”、“其它”等七类，每类中的各篇尽量按时间先后排列。这就是我们所编《谢灵运集》的基本面貌。

校勘是本集的重要工作之一。顾本的“校勘与注释是结合着进行的，没有单独列校勘记”；它“尽量做到详校（包括异文）”，“凡异文均出校”，“把不能出校的异体字减少到最低限度”；“为了尽量保持底本的原貌，除了形体极相近的讹字如‘己’讹作‘巳’、‘末’讹作‘未’，以及避讳字（包括缺笔字）径直改正不出校外，一般错字保留，而在校注中加以说明。但为了增强原文的可读性，对于极其明显的错字，则不得不在其后面加一个正字，用方括号标识，同时在校注中加以说明。对于脱文也以同样办法处理，也用方括号标识”（以上引文均见顾本《前言》）。我们除直接用前述已见各本及顾本互校外，还全部吸收了各本原有的校勘成果。凡异文而可能有音义

之殊者一律出校，但音义可以互代的异体字都直接改用通行字（如“迳”改作“径”），常见的通用字也往往直接改用本字（如“沈”改作“沉”），不一一出校；同样的异文见于多本时往往只列举一二种版本作代表，用“等”字省略其余版本。考虑到本集主要是为普通读者提供一个可读性强的读本，所以正文不必保存底本原貌，就是说，当异文比底本原文更好时，我们直接用异文更换原文，而在注释中出校说明改文依据，无法判断优劣或可此可彼的异文则仅列举于后，一般不作说明。实际上，本集正文是用众本对校，经综合取舍后改定的，并不拘泥于某一底本，但从校注中能推出各本的原貌。为了阅读方便，校、注按出现顺序混排，一般读者可看可不看的异文校勘用【】号标出，以免繁乱。校勘中提及的各种版本详情及其简称见附录六。

谢灵运诗文清新自然是就一部分句子而言，其实难注难读的地方很多。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大致有三个方面。一是夹杂玄言佛理，抽象晦涩；二是用典用事过于繁密，有时还直接搬用经子成句，不知出处就难晓其意；三则还时露雕琢痕迹，“语多生撰，非注莫解其词，非疏莫通其义”（清吴淇《选诗定论》卷十四）。如果说玄言入诗和喜用典故是当时的风尚使然，那生造词语则是他个人过分求新求奇造成的。清汪师韩曾将其“不成句法者”及蹇涩词语指摘出近百条，如“寡欲罕所阙”、“樵拾谢西茆”、“微戎无远览”、“感往虑有复，理来情无成”、“游至宜便习，兼山贵止托”、“盍上贵不事，履二美贞吉”等，乍看这样的词句，难免会“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黄节先生在《谢康乐诗注》序中也深有感触地说：“康乐之诗，合诗易聘周骚辩仙释以成之，其所寄怀，每寓本事，说山水则苞名理。康乐诗不易识也，徒赏其富艳。”其实，不只是“康乐诗不易识”，康乐之文更有难识者！因此，要想使谢灵运的诗文

集走向普及，注释解说工作是必不可少的。我们对谢诗的注释主要参考了黄节的《诗注》和叶笑雪的《选注》，也有一些篇章完全是首次创注，得到顾本后，又参考顾注对原稿作了部分修改和补正，特别是每篇的写作时间和背景，我们基本上都改从了顾先生的考证成果，在此对各位先生表示衷心的感谢。但黄注热衷于语源征引，叶注往往只概言大意，而顾注的史实与地考证又过于详赡，其实对于一般读者来说，最需要的还是疏通字词句本身的意思，因此，我们在参考三家注解的时候，大刀阔斧地删汰了不必要的引文、分析和考证资料，而将注解的重点放在字词句本身（包括典故），个别难以落实到字词或注解了字词还难以明白的句段，才采用串讲和归纳大意的办法。顾注每篇都写内容提要，叶注每首都有篇段赏析，黄注篇末也都附有古人的点评，这些对读者全面把握作品意旨确有作用，但份量太重，非一般注本所能承担，因此我们概所不取，必要时也只在题注中略为点示一下篇旨或内容。如前所述，谢文向无注本或选注本，作为全集的顾本本来是应该要注“文”的，但“考虑到诗注部分和几个必要的附录，份量已经很重，如再加上文注，篇幅实在太大了”，所以顾先生“对文采取以校为主，适当加注的办法。所谓适当加注，就是每篇仍有内容提要，同时对有些与谢灵运生平有关的人物、事件、地名等少加解说或考证；至于语词，如果不是校勘需要，则一般不进行诠释，典故也一般不加说明”（引文皆见顾本《前言》）。我们为了保持诗文注解体例的基本一致，同时也想使谢集的注释工作有所发展，所以硬着头皮在缺乏底注参考的情况下，尽量替谢文的难解词语和典故也作上注。但谢文含有大量的史实和典故，又多佛道术语，所以注起来十分困难，几乎每句都要查资料，有时字字必查，而对于生造词句和某些缺乏线索的典故史实，甚至查也查不到。为此我确实尽了最大的努力，花费了不少的时

间，但由于能力水平不够，本职工作又不允许我“旁鹜”太久，所以勉强弄到现在，好歹算是注完了，而阙疑仍然很多，已注的错误也必不少，只好请方家来补正了。由于注文繁重，如果每个注项都编号的话，就会注号太多看起来眼花缭乱又不省篇幅，所以我们尽量减少注号，使每个注号内可以容纳若干个注解项：即对于需要出注的诗文，不管注解项的多少，诗以节律句为单位，一个节律句（含两个自然句）只编一个注号；文以语意句为单位，一个语意相对完整的句子（可能包含若干个自然句）只编一个注号。又为了阅读的方便，重见于各篇的相同注解项都分别作注，一般不用“参见”的办法（本篇重出和个别费辞者可酌情使用）；诗文过长者，酌情分为若干章、段插入注解，注号序列则以篇为单位连编。注音方式采用直音，则是因为计算机输入拼音字母不方便的缘故。凡此，大致都可以算作注释方面的条例，但由于篇幅太大，操作时间过长，前后可能有不相一致的地方。

必要的附录可使全集更趋完美。顾本有《谢氏家族成员简介》、《〈隋书〉等古籍中所著录的灵运著作及所纂总集》、《评丛》、《灵运像等图片及灵运行踪示意图》等附录八种，总共近200页，约15万字。我们考虑到篇幅和一般读者的需要，集末只列六个附录，即《宋书·谢灵运传》、《谢灵运行事简谱》、焦竑《谢康乐集·题辞》、张溥《谢康乐集·题辞》、黄节《谢康乐诗注·序》、《本书校注所称书目版本情况》。其中《谢灵运行事简谱》是根据顾本《谢灵运生平事迹及作品系年》改编的。顾先生的《系年》资料考证非常详细，引述丰富，有关背景人物和事件也交代得较多，因而长达五万余字；我们不作任何考证，只取谢灵运本人的行事及少量与谢灵运有直接关系的其它人物事件列成编年简谱，不足万字，以图眉目清爽。

作为前言，本来直接交代本集的编注体例就可以了，而我

却写了不少自己的编注过程，并重点介绍了顾绍柏先生的《校注》。如此这般的用意是想向读者说明这本《谢灵运集》是由外行人弄出来的，一般读者如像我这样只想初步了解一下谢灵运，闲暇时流览流览这本集子大概也可以了，倘若要作进一步的研究，那就千万别以此书为据，一定要去拜读别的本子，特别是像顾绍柏先生那样真正称得上谢灵运专家的书。另一层意思当然是想用这种方式来表示对顾先生及我的学友们的感谢，如果不是他们给我提供了顾先生的大著作参考，我编这本集子恐怕还要走不少弯路从而拖延一些时日，而且肯定最终也编不出目前这样勉强还过得去的水平，所以我应该将顾先生的大著首先推荐给读者。

另外，师妹李俊红为我做过一些查找资料及照相的工作，堂弟李生贵在计算机录入及打印方面帮过不少忙，学友吴泽顺再三督促和鼓励，妻子杨跃飞和女儿李西尧也多所支持，谨此一并致谢。

李运富

1999年2月

目 录

前 言	1
-----	---

上编 诗集

诗一 行事诗

1 答中书 (八章)	1
2 赠安成 (七章并序)	6
3 赠从弟弘元 (六章并序)	10
4 赠从弟弘元时为中军功曹住京 (五章)	14
5 岁暮	17
6 九日从宋公戏马台集送孔令	18
7 彭城宫中直感岁暮	20
8 三月三日侍宴西池	21
9 答谢咨议 (八章)	22
10 永初三年七月十六日之郡初发都	27
11 邻里相送至方山	29
12 过始宁墅	30
13 富春渚	32
14 初往新安至桐庐口	34
15 夜发石关亭	35
16 七里濑	35
17 晚出西射堂	37
18 登永嘉绿嶂山	38